

【行业分析】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多重驱动路径研究

——基于“需求—供给—支持”框架的组态分析

查建平 李程 谭庭 贺腊梅 徐单单

【摘要】文旅融合是实现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补齐旅游业发展短板、推进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本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我国 2010-2019 年 30 个省区市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展开评估,随后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需求、供给和支持 3 个方面的驱动条件探究我国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2)从我国整体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来看,需求与支持条件起重要作用,居民消费能力与区位交通条件的作用尤其突出。(3)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为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发展路径,中部则呈现出支持条件驱动型与需求条件驱动型两种发展路径,西部存在需求条件驱动型与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两种路径。因此,地方政府应重视供给、需求、支持多重条件的协同匹配,根据地方发展条件切实调整文旅开发策略,有针对性地提升核心驱动能力以突破发展瓶颈。

【关键词】文旅融合;产业融合;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查建平(1986-),男,安徽安庆人,博士,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文旅大数据等,E-mail:jianping_zha@hotmail.com;李程(1999-),女,湖北黄冈人,四川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通讯作者,E-mail:licheng_1999@foxmail.com;谭庭(1995-),男,四川广安人,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低碳经济;贺腊梅(1992-),女,重庆人,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专职科研),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旅游、旅游能源消耗;徐单单(2000-),女,四川达州人,四川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四川成都 610000)。

【原文出处】《旅游导刊》(京),2024.1.30~59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下文化与旅游融合效应提升机制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项目编号:23YJA790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福利绩效视角下旅游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2102158)、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游客体验的虚拟沉浸式技术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3NSFSC3447)和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效应视角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动力、机制与路径”(项目编号:scuhistory2022-5)资助。

观点与创新:

- 构建了“需求—供给—支持”的多层级文旅融合优化路径指标体系
- 应用 fsQCA 方法探究文旅融合水平的多重条件联动作用
- 总结归纳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文旅融合

发展路径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多年连续保持 10% 以上的高增长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攀升(罗浩、颜钰堯、杨旸,2016)。然而,在我国旅游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以资

源投入、人力投入带动旅游总量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也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浪费,削弱了区域旅游发展潜力(金春雨、程浩、宋广蕊,2012;Zha & Li, 2017;Zha, He & Zhu, et al., 2022)。面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通过大量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难以行效,旅游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文旅融合能够显著提升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吸引力,解决要素驱动式旅游发展引致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劣质化等问题,是破解我国旅游业发展困境的关键举措,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和业界广泛关注(马晓京,2000;Liu, 2018;徐翠蓉、赵玉宗、高洁,2020)。

文化与旅游产业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耦合关系。一方面,文化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关系与耦合原理相契合。二者之间能够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彼此影响并相互连接(Li, Li & Zhou, et al., 2012)。另一方面,产业融合与耦合协调拥有相同的发展前提与目标,依托于文旅产业的空间合理布局来实现产业价值与绩效的提升(鲍洪杰、王生鹏,2010;Fan & Xue, 2020)。因此,学界主要以二者的耦合发展关系衡量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基础和系列成果(汪永臻、曾刚,2020;朱媛媛、周笑琦、顾江等,2022)。其中,定量研究主要运用计量方法分析文旅融合的影响因素,基于传统的对称研究方法探索各变量的边际净效应和二元交互作用(翁钢民、李凌雁,2016;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赵书虹、陈婷婷,2020;唐睿,2022;郑陈柔雨、杨存栋、任雯星,2022)。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传统方法的缺陷导致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学界在解释文旅融合的内在机理时莫衷一是(洪学婷、黄震方、于逢荷等,2020;李丽、徐佳,2020;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

文旅融合水平的提升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生高融合水平的因素与导致低融合水平的因素往往不一致,具有显著的非对称特征(张春香、刘志学,2007;李锋、陈太政、辛欣,2013)。而传统的回归分析具有对称性,若发现某个因素的增长导致了因变量的增加,则推定该因素的减少将导致

因变量降低(Douglas, Shepherd & Prentice, 2020)。虽然不同变量对文旅融合水平存在“净效应”,然而多种因素的互动可能会产生替代作用或互补作用,即“ $1+1<2$ ”或“ $1+1>2$ ”(Douglas, Shepherd & Prentice, 2020)。这种因果复杂性问题通过探索单个因素的净效应或者至多3个变量的调节效应是无法完全解释的,因此需要引入一种能够处理复杂因果关系的实证方法,以探究更为合理可行的发展路径(Fiss, 2011)。美国学者Ragin(2008)提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为处理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方法。该方法能够识别出产生相同结果的多种路径,在解释因果不对称、非线性关系等因果关系复杂的研究问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管理、营销、信息系统等多个领域(杜运周、贾良定,2017;Xie & Wang, 2020;陶克涛、张术丹、赵云辉,2021)。鉴于此,本文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我国文旅融合高水平发展的等效多维路径,为我国文旅融合高水平发展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建议。

具体而言,本研究首先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文旅产业融合水平,而后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其组态优化路径。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及新冠疫情对文旅产业的冲击,本研究采用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暂缺,未纳入统计)的数据,对文旅产业融合水平及其驱动路径展开评估。本文贡献有如下几点:第一,长期以来,文旅产业融合动力相关研究以定性探讨为主,定量分析则多受到线性回归方法的限制,研究视角基于单一影响因素独立效果,而本研究将视角转向多重条件联动作用,深入阐释文旅融合水平提升背后的“因果复杂性”。第二,通过系统整合产业融合的动力要素,构建“需求—供给—支持”的多层级文旅融合优化路径指标体系,探究多种因素的联合效应和互动关系,揭示文旅产业提升路径的复杂特征。第三,将fsQCA方法引入文旅融合机制的研究中,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方法,为文旅产业融合动力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提供参考。第四,本研究试图通过进一步探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文旅融合发展驱

动路径的差异,挖掘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中的地域异质性。

一、文献综述

文旅融合指文化、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之间相互渗透、交叉汇合或整合重组,彼此交融而形成新的共生体的现象与过程(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通过协调文化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文旅融合能够助推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资源、经济与社会多维效应,也是产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张苏秋、顾江、王英杰,2020;冯学钢、梁茹,2022)。随着学界对文旅融合的广泛关注,相关探讨日趋深入,主题涵盖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理论内涵、概念辨析、融合机理、发展路径与业态创新等方面(傅才武,2020;马波、张越,2020;徐翠蓉、赵玉宗、高洁,2020;张朝枝、朱敏敏,2020)。而在当前文旅产业融合评价研究中,利用耦合模型测度文旅融合水平是目前衡量文旅产业融合水平的主流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鲍洪杰、王生鹏,2010;张琰飞、朱海英,2013;袁俊、高智,2018;Fan & Xue,2020;汪永臻、曾刚,2020)。

基于文旅活动的天然联系以及市场需要,文化与旅游产业资源共通、人才共享、市场重合,并通过技术、业务和市场整合相互渗透或重组形成新的产品,构成了密切相关、彼此促进的耦合系统(侯兵、周晓倩,2015;马勇、童昀,2019)。已有不同学者基于国家层面(翁钢民、李凌雁,2016;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区域层面(鲍洪杰、王生鹏,2010;Li, Li & Zhou, et al., 2012;袁俊、高智,2018;汪永臻、曾刚,2020;于秋阳、王倩、颜鑫,2022)对文旅融合水平展开测算,相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文旅融合发展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

文旅融合对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使得文旅融合动力机制成为热门学术议题,学者们也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此展开探究(徐翠蓉、赵玉宗、高洁,2020)。定性研究基于案例分析、产业融合理论、系统动力学等,主要围绕供给端、消费端以及

外部环境3个层面,将文旅产业融合动力划分为内在驱动力与外生性动力,提炼出文旅融合发展的逻辑框架、发展路径(张海燕、王忠云,2010;程晓丽、祝亚雯,2012;张琰飞、朱海英,2013;曲景慧,2016;田里、张鹏杨,2016;孙剑锋、李世泰、纪晓萌等,2019;龙井然、杜姗姗、张景秋,2021;厉新建、宋昌耀,2022)。而实证研究多采用线性回归等传统的对称研究方法,聚焦产业基础、旅游资源、需求状况、经济水平、政府扶持等要素的线性影响(张春香、刘志学,2007;翁钢民、李凌雁,2016;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赵书虹、陈婷婷,2020;唐睿,2022;郑陈柔雨、杨存栋、任雯星,2022)。值得注意的是,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同一因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研究背景下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基础设施在不同情境下能够对文旅融合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效果,分别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与反向抑制作用(洪学婷、黄震方、于逢荷等,2020;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经济发展水平在部分研究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其他研究中则表现不显著(洪学婷、黄震方、于逢荷等,2020;李丽、徐佳,2020)。有差异性的研究结果说明文旅融合水平能否提升取决于各因素之间的互动模式,而非这些因素作用的简单线性加和。

换言之,文旅融合水平提升是一个典型的“多重并发因果”问题。每个因素并非独立地对融合水平构成影响,而是通过与其他因素组合联动以共同产生作用,因而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前因条件组合。然而,现有研究多利用传统对称研究方法研究复杂因果问题,该方法存在两个缺陷:首先,传统对称研究方法假设自变量之间是非共线性的,各变量的作用效果被离散地考虑,忽视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必然会留下大量难以解释的结果差异,进而导致有差异的研究结果(Douglas, Shepherd & Prentice, 2020);其次,传统对称研究方法虽然能够发现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自变量,对文旅产业发展有一定启示意义,但不能反映特定的旅游发展情境,难以对差异性结果作出全面且合理的解释(Douglas, Shepherd & Prentice, 2020)。而组态研究是处理因果复杂性问题

的有效方法,能够通过分析多个因素之间的配置关系弥补已有研究不足,因此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杜运周、贾良定,2017;Xie & Wang,2020)。然而,目前基于全国尺度探究文旅融合驱动路径的研究仍较为少见。虽然近两年有学者注意到组态研究的必要性并将其引入文旅融合领域,但现有研究仅探究了特定类型的文旅融合驱动路径,样本代表性不足,文旅融合发展的驱动模式仍有待厘清(张圆刚、黄业坚、余向洋,2021;唐承财、刘亚茹、万紫微等,2023)。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1.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测度

(1)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测度指标

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我国 2010—2019 年 30 个省区市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本文综合已有研究,基于可得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从人力资本、固定资产、产业基础、产业效应 4 个方面筛选指标(翁钢民、李凌雁,2016;袁俊、高智,2018;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吴丽、梁皓、虞华君等,2021)。第三产业具有突出的劳动密集特点,人力资本是文旅产业的关键保障;固定资产是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反映文旅产业规模的重要指标;产业基础是耦合的物质基础,本文从地方资源禀赋和产业供给条件两方面衡量文旅产业基础;产业效应是基本表征,能够反映产业效益及地位(吴丽、梁皓、虞华君等,2021)。

为避免因产业规模不同而造成测算结果偏差,本研究既选择了体现区域产业规模的总量指标,亦选择了反映产业平均发展水平的相对指标。此外,文化产业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指标体系难以穷尽。由于通常认为文化以事业发展为主、产业发展为辅(冯学钢、梁茹,2022),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选择了以文化事业机构及市场经营机构相关指标共同衡量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翁钢民、李凌雁,2016;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文化与文物统计年鉴(2011—202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1—2018)》《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0)》,以及 2011—2020 年各省区市

统计年鉴、2011—2020 年各省区市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对于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处理。产业收入比重为产业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参观人次比重为参观人次与地区常住人口之比,入境旅游收入单位为美元,利用 2010—2019 年各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为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本研究以 2010 年为基期,利用 2011—2019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分别对旅游收入、固定资产、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减。

(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度是反映两个系统耦合程度的重要指标,能够有效判别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及其作用的时序区间(鲍洪杰、王生鹏,2010)。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时,耦合度难以反映出子系统之间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单纯依靠耦合度判别产业融合水平可能产生误导性结果(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2005)。为进一步评价系统间的整体协同效应,有研究引入耦合协调度对复杂系统特定状态进行量化评判,该指标能够定量反映出各子系统或要素间的协调状态(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2005;张勇、蒲勇健、陈立泰,2013;黄婧涵、蓝庆新、展金泳,2023)。因此,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引入耦合协调模型以评判文化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关系和动态变化情况(张勇、蒲勇健、陈立泰,2013;Tang,2015;曲景慧,2016),计算步骤如下。

①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M_{ijt} = \frac{x_{ijt} - x_{j \min}}{x_{j \max} - x_{j \min}} \quad (1)$$

$$N_{ijt} = \frac{x'_{ijt} - x'_{j \min}}{x'_{j \max} - x'_{j \min}} \quad (2)$$

其中, x_{ijt} 、 x'_{ijt} 分别表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第 t 年 i 地第 j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 $x_{j \max}$ ($x_{j \min}$)、 $x'_{j \max}$ ($x'_{j \min}$) 分别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中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 M_{ijt} 、 N_{ijt} 分别为第 t 年 i 地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为避免后续运算中出现分母为 0 的情况,将无量纲化处理后的零

表 1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Subsystem	Primary index	Secondary index
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人力资本	· 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从业人员比重
	固定资产	· 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固定资产
	产业基础	· 万人拥有艺术表演场馆、艺术表演团体、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群众艺 术馆数量
		· 万人拥有文物藏品数
	产业效应	·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总收入比重 · 艺术表演场馆、艺术表演团体、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参观 人次比重
旅游产业 Tourism industry	人力资本	· 星级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从业人员比重
	固定资产	· 星级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固定资产
	产业基础	· 人均旅游资源禀赋得分计算公式为:人均旅游资源禀赋得分=(5A 级景区数 量×50+4A 级景区数量×40+3A 级景区数量×30+2A 级景区数量×20+1A 级景区 数量×10)/年末常住人口
		· 万人拥有住宿餐饮业企业数
	产业效应	· 国内、入境旅游收入比重 · 国内、入境旅游人次比重

值替换为 0.00001。

3⋯,n);w_j、w'_j 分别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指标权重。

②利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计算公式为:

$$s_{ijt} = \frac{x'_{ijt}}{\sum_{t=1}^r \sum_{i=1}^m x'_{ijt}}$$

(3)

$$h_j = -\frac{1}{\ln m} \sum_{t=1}^r \sum_{i=1}^m s_{ijt} \cdot \ln s_{ijt}$$

(4)

$$\alpha_j = 1 - h_j$$

(5)

$$w_j = \frac{\alpha_j}{\sum_{j=1}^n \alpha_j}$$

(6)

其中,s_{ijt} 为第 t 年 i 地第 j 项指标的比重;h_j、α_j、w_j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差异系数、权重。

③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公式为:

$$F(i,t) = \sum_{j=1}^n w_j \cdot M_{ijt}$$

(7)

$$H(i,t) = \sum_{j=1}^n w'_j \cdot N_{ijt}$$

(8)

其中,F(i,t)、H(i,t) 分别代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系统的评价指数;j 指代指标个数(j=1,2,

④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产业综合协调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公式为:

$$T(i,t) = \alpha \cdot F(i,t) + \beta \cdot H(i,t)$$

(9)

$$C(i,t) = \sqrt{\frac{F(i,t) \cdot H(i,t)}{C(i,t) + T(i,t)}}$$

(10)

$$D(i,t) = \sqrt{[F(i,t) \cdot H(i,t)]^2}$$

(11)

其中,T 为文旅产业综合协调指数;C 为耦合度;D 为耦合协调度;α、β 为待定系数,均设为 0.5(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2013;袁俊、高智,2018)。

2. 文旅融合发展驱动路径分析方法

(1) 文旅融合驱动路径指标体系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产业结构、产业规模、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经济水平、政府扶持等要素对文旅融合的影响,这些驱动要素可被归类为供给要素、消费要素以及外部环境要素 3 个方面(李锋、陈太政、辛

欣,2013;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厉新建、宋昌耀,2022;唐承财、刘亚茹、万紫微等,2023),因此本研究综合相关文献,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从供给、需求、支持3个层面构建基于“需求—供给—支持”条件的三层级文旅融合驱动路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供给条件:①产业规模扩大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带来经济收益和融合效率的共同提升。本文从文旅企业数量与人力规模两个层面衡量产业规模,选取文化市场娱乐场所数量、旅游企业个数衡量文旅企业数量;以文化市场娱乐场所从业人数、旅游业从业人数表示文化产业人力规模、旅游产业人力规模(王经绫,2020)。②资源禀赋是文旅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载体。本研究以各省区市文化市场机构数量、旅游景区数量表征文化资源要素、旅游资源要素(洪学婷、黄震方、于逢荷等,2020;李丽、徐佳,2020)。③鉴于产业专业性在信息传递、资源交换、合作共享等环节的重要作用,本文参考Yang(2012)的研究,用省级文化、旅游产业总收入分别占中国文化、旅游产业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省级文旅产业相对专业化程度,以文化市场机构总收入、旅游企业总收入衡量文化、旅游产业收入,并使用省面积来平衡该指标,如公式(12)。

$$Den_{i,t} = \frac{SOTI_{i,t}}{\sum_{i,t} SOTI_{i,t} / area_{i,t}} \quad (12)$$

需求条件:文旅需求是文旅消费意愿和消费能

力统一的体现,而地方文旅产品消费能力又受到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两方面购买力的影响,因而将客源市场规模和居民消费水平列为需求条件,选取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表征居民消费水平,文化、旅游客源市场规模则分别以博物馆参观人次和A级景区接待人次衡量(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吴丽、梁皓、虞华君等,2021)。

支持条件:①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为文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本研究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李丽、徐佳,2020)。②地区交通便利程度构成文旅消费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交通优势因而成为文旅融合的一大保障(石燕、詹国辉,2021)。本研究利用各省区市公路及铁路总里程与全省面积之比衡量区位交通条件(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③数字化技术能够改变消费者的休闲观念及消费行为,并凭借技术优势对相关产业进行渗透和资源整合,重塑文旅产业的产品构成,对文旅融合新格局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戴斌,2019/2020;冯学钢、程馨,2022;吴丹丹、冯学钢、马仁锋等,2023)。本研究以移动电话普及率衡量数字化技术(Zhang, Cheng & Wei, et al., 2018)。④城镇化发展能够为文旅产业创造发展条件,形成良性产业循环,为地区经济增加发展动力并促进产业升级(陈红玲、郑馨,2021),而且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的城市通常拥有较强的人口吸纳能力,进而能够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为文旅产业提供劳动力供给与消费市场(陈红玲、郑馨,2021)。本研究以地区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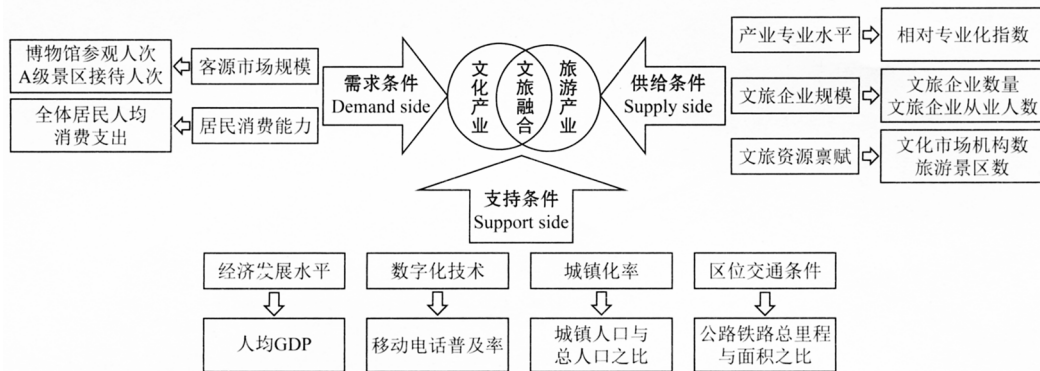


图1 文旅融合驱动路径指标体系

Fig. 1 Indicator system of improvement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的常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城镇化率。

以上指标数据来自《中国文化与文物统计年鉴(2011-202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1-2018)》,以及2011-2020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本研究采用极值熵值法处理涉及文化与旅游两个产业数据的指标,对于个别年份的数据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处理。为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本研究以2010年为基期,利用2011-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对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进行平减。

(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区别于传统的统计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基于布尔代数和模糊集理论,能够通过分析因素之间的互补关系处理因果关系复杂的研究问题(Ragin, 2008)。fsQCA是QCA方法的一种,其一致性评估更为准确,并且能够适用于连续变量,因而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来识别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中潜在的不对称因果条件(Ragin, 2008; Xie & Wang, 2020)。

fsQCA假设因果关系是复杂和可替代的,并认为不同的因素组合可以导致相同的社会现象发生,而这些组合就可以被视为理想路径的可能集合,其逻辑条件与解释力通过一致性和覆盖率两个指标判断(Zhu, Luo & Dong, et al., 2021)。一致性和覆盖率的计算公式为:

$$\text{Consistency}(X \leq Y) = \sum \min(x_i, y_i) / \sum x_i \quad (13)$$

$$\text{Coverage}(X \leq Y) = \sum \min(x_i, y_i) / \sum y_i \quad (14)$$

其中, x_i 表示组合中单个因子的隶属度; y_i 表示结果 Y 中单个因子的隶属度。一致性可以类比于传统定量研究的拟合优度,代表组态解多大程度上是结果的子集;覆盖度用于判断前因条件 X 对结果条件 Y 的解释力度,可细分为“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前者指组态解覆盖所关注结果案例的比例,包括多个组态解的重叠覆盖部分;后者指刨除重叠覆盖部分后,只能由特定组态解单独解释部分的比例。

三、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及其驱动路径

本文首先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2010-2019年我

国30个省区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展开评估,随后基于文旅融合驱动路径指标体系,运用fsQCA方法探究我国文旅融合高水平发展模式。

1. 我国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时空演化特征

如下页图2a所示,2010-2019年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提升明显,30个省区市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数 $F(i, t)$ 、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 $H(i, t)$ 、文旅产业耦合度 $C(i, t)$ 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07%、9.32%、4.70%。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水平 $D(i, t)$ 均值及其极差、标准差如图2b所示。研究发现,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年均增长7.25%,表明我国文旅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稳步上升,而研究期内极差值在0.34~0.46波动,说明我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状态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且这种区域差距并未随产业发展而逐渐消失。

本文参考Tang(2015)的研究,将文旅产业耦合协调状态划分为6个等级,分别为严重失衡、中度失衡、轻度失衡、初步协调、高度协调及极度协调。各省区市2010、2014、2019年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演化情况如下页图3所示,结果表明其间我国文旅产业严重失衡地区逐步减少,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北京、上海等直辖市文旅产业表现突出。虽然我国文旅产业整体获得较大提升,但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偏低、文旅产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题依旧突出,这与翁钢民和李凌雁(2016)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此外,翁钢民和李凌雁(2016)的研究还发现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部分地区溢出效应明显,带动了相邻区域的融合发展,进而形成良性互动、强强联合的发展局面。因此,从实现产业均衡充分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提升区域要素间的同频共振与协同发展,缩小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差异,让闲置资源在区域之间充分流动(李臻, 2019; 朱鹤、张圆刚、林明水等, 2021)。

2. 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驱动路径

本研究以文旅融合驱动路径指标体系作为前因条件,选取耦合协调度 D 为结果变量 Y 。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校准,分别将0.75、0.25百分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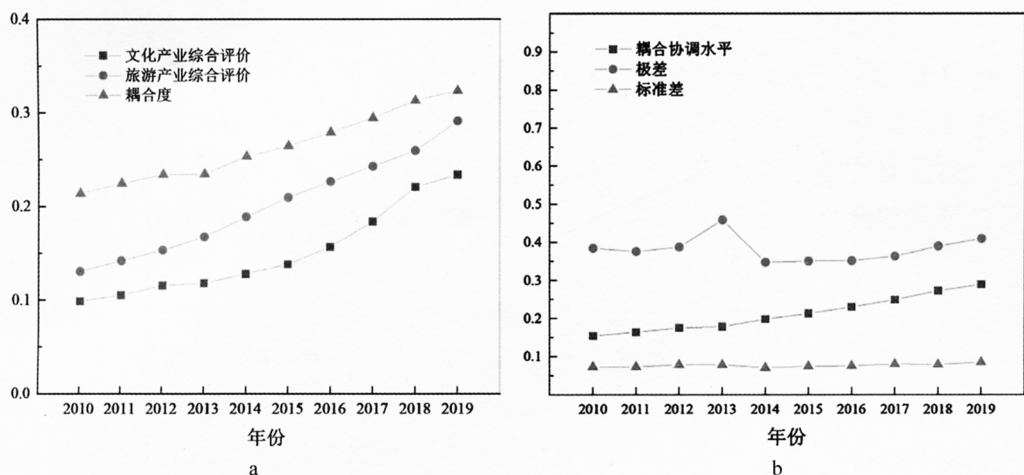


图2 文旅产业融合水平时序变化

Fig. 2 Mean changes of integr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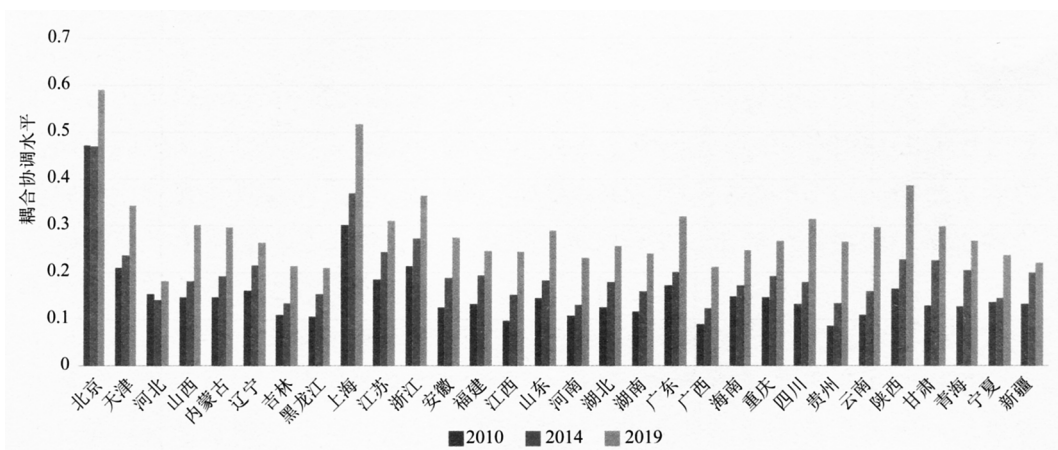


图3 文旅产业耦合协调等级演化

Fig. 3 The evolution of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hierarchy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作为完全隶属度、不完全隶属度的阈值,将变量中值作为交叉点,运用 fsQCA 3.0 软件对校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Ragin, 2008)。

(1) 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前,需要逐一检验单一条件及其非集 (~) 是否构成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 0.9,说明任一因子不能单独构成影响 (~) 文旅产业耦合协调的必要条件。

(2) 组态分析

不同于上文对单个条件变量的充分性分析,组态分析能够探索由多个条件构成的文旅产业融合高水平发展路径,因而进一步将上述前因条件纳入

fsQCA 3.0 软件中进行组态分析。为避免矛盾组态出现,本文将最低案例频数设定为 5,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 PRI 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75。组态分析将产生 3 种复杂程度不同的结果: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其中,复杂解普适性较差;简约解的结论过于简单,缺乏启发性;因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解在研究中更受欢迎。本研究参考 Fiss (2011) 的呈现方式,以中间解为主,并结合简约解区分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呈现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以 2010—2019 年我国 30 省区市为案例能够挖掘出 4 个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单个解及其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0.75,表明 4 种组态均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充分条件组合(典型案例分别展示于

下页图 4)。

在组态 1 中,文旅企业规模、文旅资源禀赋和客源市场规模的缺失以及产业专业水平的存在发挥边缘作用,数字化技术为无关紧要的条件。该组态覆盖的案例较少,典型案例为上海、重庆、海南这些文

旅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这类案例地积累了一定的旅游知名度,拥有较为成熟的文旅产业发展模式。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发达的区位交通条件,为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参与文旅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消费条件。

表 2 必要条件分析
Tab. 2 Necessary conditions analysis

文旅产业耦合协调		~文旅产业耦合协调~		文旅产业耦合协调		~文旅产业耦合协调~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条件变量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条件变量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dition variable	industries	industries		condition variable	industries	industries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Consistency	Raw coverage	Consistency	Raw coverage	Consistency	Raw coverage	Consistency	Raw coverage	
产业专业水平	0.56	0.58	0.49	0.52	~产业专业水平	0.53	0.51	0.60	0.58
企业人力规模	0.55	0.56	0.50	0.52	~企业人力规模	0.52	0.50	0.57	0.57
文旅资源禀赋	0.48	0.49	0.58	0.61	~文旅资源禀赋	0.61	0.59	0.51	0.50
客源市场规模	0.59	0.59	0.48	0.49	~客源市场规模	0.50	0.48	0.61	0.60
居民消费能力	0.83	0.83	0.28	0.29	~居民消费能力	0.30	0.29	0.84	0.83
数字化技术	0.81	0.80	0.31	0.32	~数字化技术	0.31	0.30	0.80	0.81
经济发展水平	0.69	0.69	0.39	0.40	~经济发展水平	0.40	0.39	0.70	0.70
城镇化率	0.75	0.75	0.34	0.35	~城镇化率	0.35	0.34	0.75	0.76
区位交通条件	0.67	0.66	0.43	0.44	~区位交通条件	0.43	0.43	0.67	0.68

注:“~”表示逻辑非。

表 3 文旅融合高水平发展路径组态分析

Tab. 3 Configurations for the high-level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前因条件 Condition	供给条件			需求条件			支持条件			一致性 Consistency	覆盖度 Raw coverage	唯一覆盖度 Unique coverage	总体一致性 Overall solution consistency	总体覆盖度 Overall solution coverage	
	Supply side			Demand side			Support side								
	产业	文旅	文旅	客源	居民	经济	城镇	区位	数字						
	专业	企业	资源	市场	消费	发展	化率	交通	化技						
	水平	规模	禀赋	规模	能力	水平	条件	术							
组态路径 Configuration	1	•	⊗	⊗	⊗	●	•	•	●		0.93	0.16	0.09	0.94	0.44
	2	⊗	•	•	•	●	•	•	●	⊗	0.91	0.07	0.03		
	3	•	•		•	●	•	•	●	•	0.94	0.28	0.15		
	4	•	•	⊗		●	•	•	●	•	0.96	0.14	0.03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乏,⊗代表边缘条件缺乏;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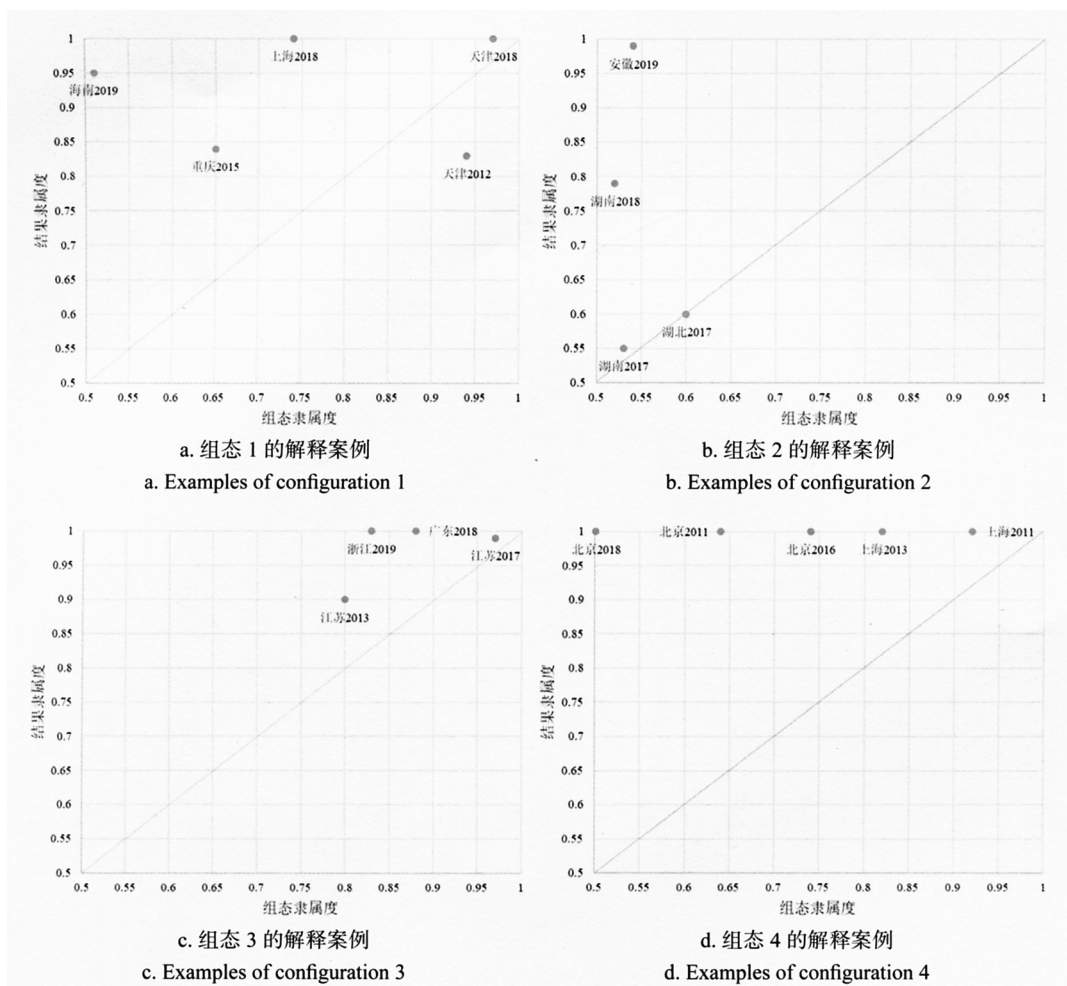


图 4 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组态的解释案例

Fig. 4 Examples of configurations betwee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在组态 2 中,文旅企业规模、文旅资源禀赋和客源市场规模的存在以及产业专业水平、数字化技术的缺失发挥边缘作用。这类案例地主要为资源禀赋要素具备优势但文旅产业专业水平尚不成熟的中部省份,如湖南、安徽。与其他发展路径相比,组态 2 是在文旅相对滞后的产业开发模式中探索,意味着文旅产业模式尚未成熟的案例地在依托有利经济环境、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区位交通条件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扩大产业规模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在组态 3 中,产业专业水平、文旅企业规模和客源市场规模的存在均为辅助条件,文旅资源禀赋为无关紧要的条件。这类案例地主要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如广东、江苏。该模式依托有利的区位交通以

及较高的城镇化水平,能够发挥城市的规模聚集效应,形成可观的文旅产业规模和专业水平,同时打造迎合市场需求的文旅服务产品,以促进市场需求并拉动消费。

组态 4 与组态 3 拥有多个相同的边缘条件,而在客源市场规模、文旅资源禀赋两个条件上存在差别,其典型案例为北京和上海。

从单个条件的角度(纵向)看,可以发现居民消费能力与区位交通条件在 4 种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在 4 个发展路径中均发挥补充作用。为进一步探究核心条件(居民消费能力和区位交通条件)与文旅融合水平的关系,分别对 2010、2014、2019 年 30 个省区市的数

据样本作散点图(见图5)。结果表明,兼具有利消费能力与区位交通条件的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文旅融合水平,这与洪学婷、黄震方和于逢荷等(2020)以及朱媛媛、周笑琦和顾江等(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消费需求与交通状况方面具有优势的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发展条件,这启示地方政府在制定文旅产业规划时应着重考虑市场需求和支持条件,配合地区产业结构制定发展规划;而那些正处于文旅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地区,则应瞄准核心驱动力,推动道路交通立体化建设,通过加大金融支持等鼓励居民增加消费。

四、我国东、中、西部文旅融合发展的差异化路径

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是资本投入、社会消费支撑

等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影响进而共同成为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2013)。由于受地方文化、区位条件等影响,我国不同地区文旅产业发展差异明显。为进一步比较与分析我国各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差异,本研究采取传统的三大地带划分法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陈秀琼、黄福才,2006),分别对其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展开评估,结果如表4所示(Fiss,2011)。

我国东部地区存在4种文旅融合发展组态,居民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为其共同的核心条件,其他的供给或支持条件未对文旅融合发展构成限制,因而将东部发展模式命名为以居民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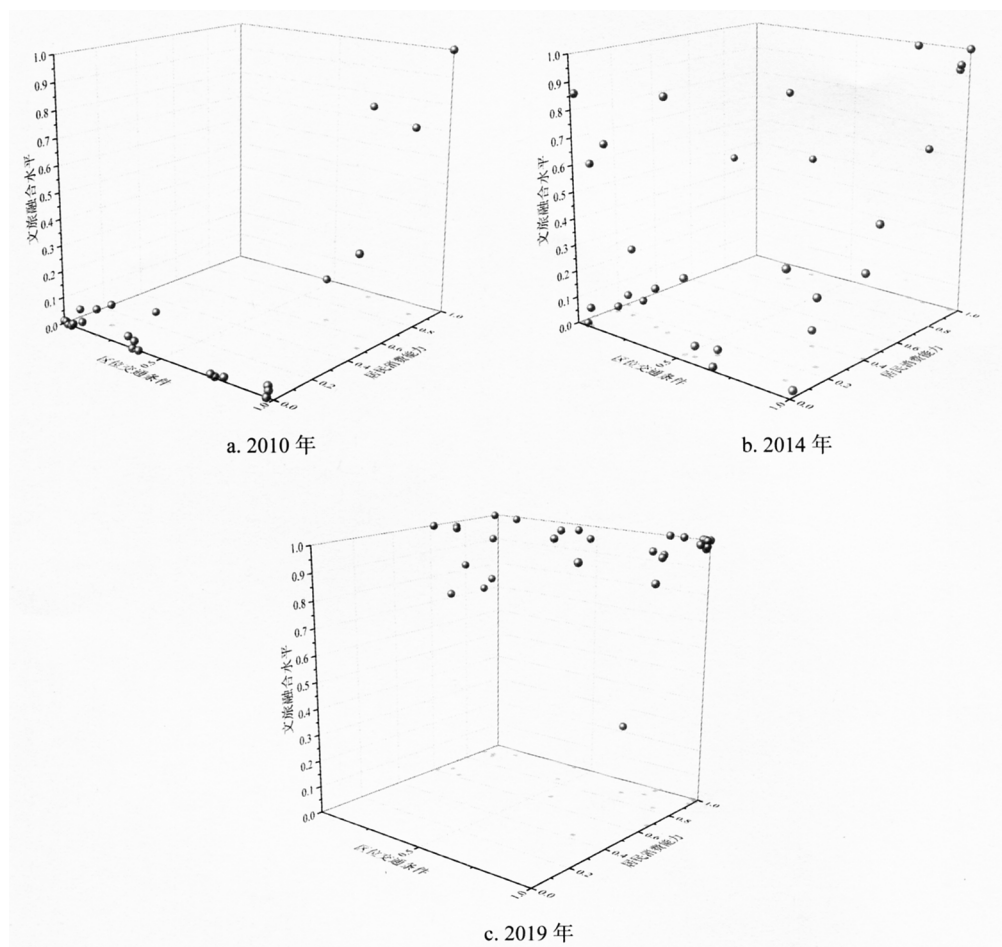


图5 核心前因条件与文旅融合的相关关系

Fig.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e condi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路径。4 种组态的总体解的覆盖率为 0.52,说明 4 种组态能够解释东部地区 52%的案例。文旅资源禀赋的缺失在其中 3 个组态中发挥辅助作用,说明以居民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发展路径能够冲破资源禀赋条件限制。实际上,文旅融合并非旅游与文物的简单加和,还包括旅游与流行文化、演艺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徐翠蓉、赵玉宗、高洁,2020;厉新建、宋昌耀,2022)。从实践角度而言,文旅产业经营者能够根据消费需求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独具魅力的文旅产品,构造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吸引

物作为文旅活动载体,并利用活动策划和市场营销来破除资源禀赋不足的制约(张进福,2021;厉新建、宋昌耀、殷婷婷,2022;张雪晶、陈巧媛、李华敏,2022)。此外,正如厉新建和宋昌耀(2022)提出的高质量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资源观,如果不能借助合适的手段将文旅资源转化为有效的产品,即便资源具有突出价值也未必符合消费需求,因而难以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对象。

中部地区也存在 4 种文旅融合发展组态,可分为两种发展路径。在组态 5 和组态 6 中,区位交通

表 4 东、中、西部地区文旅融合发展(高水平)组态分析

Tab. 4 Configurations for the high-level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前因条件 Conditions		组态路径 Configurations									
		东部				中部				西部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组态 7	组态 8	组态 9	组态 10
供给条件 Supply side	产业专业水平		·	·	·	⊗		⊗	·	⊗	·
	企业人力规模	·		⊗	⊗	·	·	⊗	·	⊗	·
	文旅资源禀赋	·	⊗	⊗	⊗	·	·	⊗	⊗	⊗	
需求条件 Demand side	客源市场规模	·	⊗		⊗	·	·	⊗	·	⊗	●
	居民消费能力	●	●	●	●	·	·	●	●	●	·
	经济发展水平	●	●	●	●	·	·	⊗	⊗		·
支持条件 Support side	城镇化率	⊗	·	·	⊗		·	·	⊗	·	·
	区位交通条件	⊗	·	·	·	●	●	⊗	·	⊗	·
	数字化技术	·	·	·	⊗	●	●	·	⊗	·	●
一致性 Consistency		0.91	1.00	1.00	0.97	1.00	1.00	0.91	0.95	0.92	1.00
覆盖度 Raw coverage		0.17	0.25	0.27	0.12	0.21	0.23	0.19	0.11	0.22	0.19
唯一覆盖度 Unique coverage		0.13	0.06	0.08	0.05	0.03	0.05	0.15	0.04	0.18	0.16
总体一致性 Overall solution consistency			0.96				0.95				0.95
总体覆盖度 Overall solution coverage			0.52				0.46				0.37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乏,⊗代表边缘条件缺乏;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条件与数字化水平的存在发挥核心作用,区位交通与数字化水平均属于支持条件,因而将组态 5、组态 6 命名为以区位交通与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支持条件驱动型发展路径。该路径模式为对外招徕游客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中部地区临近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具有地缘优势(陶克涛、张术丹、赵云辉,2021),良好的区位交通可以提高外地游客可进入性;而数字化技术则在当下旅游营销中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文旅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游览信息和线上服务。在组态 7 和组态 8 中,居民消费能力的存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缺失发挥核心作用,因而将其命名为居民消费能力主导的需求条件驱动型发展路径。这进一步说明了消费需求对于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西部地区存在 2 种文旅融合发展组态。不同的需求条件在两个组态中均发挥核心作用,数字化水平的存在亦分别作为辅助条件和核心条件存在于组态 9、组态 10 中,因此将组态 9 命名为以居民消费能力为主导的需求条件驱动型发展路径,将组态 10 命名为以客源市场规模与数字技术为主导的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发展路径。文旅资源禀赋的缺失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组态 9 中,再次说明需求条件驱动型的发展路径能够有效突破资源不足的瓶颈。我国西部地区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相较于东部与中部地区,在产业供给、市场规模、区位交通等方面不具优势,而数字技术的进步催生出新的营销方式与产业链条,拓展了文化旅游体验的产业价值链,能够有效提升文旅消费的便捷性,加强消费者现场体验感(戴斌,2020),提高目的地吸引力,进一步为西部地区文旅产业提供发展机遇。例如,重庆洪崖洞景区在 2017 年因与影视作品《千与千寻》场景高度相似而走红于短视频平台,内容传播量达到十亿级,极大提高了重庆市旅游知名度与吸引力,使得重庆游客流量井喷式爆发(杜梦珽、杨晓霞、陈鹏,2020)。

从单一条件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居民消费能力

在文旅融合中扮演重要角色,显示出文旅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客源市场的特征,进一步验证了消费是产业发展牵动力的观点(彭华,1999)。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条件与数字化水平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表明区域基础设施能够在特定情境中对文旅融合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不同区域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别的,这为不同研究在基础设施变量上的结果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洪学婷、黄震方、于逢荷等,2020;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2020)。综上可知,不同区域间的文旅产业融合路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究其本质是地区发展条件差距引致的驱动模式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已有定量研究多从独立因素角度探讨文旅融合的影响因素,缺乏对文旅融合复杂前因的探索。本文首先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估我国 30 个省区市 2010—2019 年文旅产业融合水平,随后构建起“需求—供给—支持”的多层级文旅融合优化路径指标体系,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我国文旅融合的驱动路径,揭示了影响文旅融合水平的核心条件及要素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结论如下:

(1)研究期内我国文旅产业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但全国整体产业协调水平较低,且各省区市的产业发展差距并未随着整体水平的提升而缩小。(2)从我国整体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来看,任何供给、需求、支持条件都不能单独作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单一要素亦不能构成对文旅融合发展的限制。其中,需求与支持条件对文旅融合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居民消费能力与区位交通条件作用突出。(3)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究其本质是经济与产业发展条件差距引致的驱动模式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为以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发展路径;中部地区存在两种发展路径,分别为以区位交通与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支持条件驱动型、以居民消费能力为主导的需求条件驱动型发展路

径;西部同样存在两种发展路径,分别为以居民消费能力为主导的需求条件驱动型发展路径、以客源市场规模与数字技术为主导的需求—支持条件叠加型发展路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文旅融合现实实践有3个方面的启示及建议:首先,地方政府应重视供给、需求、支持等多重条件的协同匹配,尤其重视地区市场需求与区位交通状况,以产业整体提升为目标规划产业结构,根据地方消费市场等产业发展环境制定文旅战略,避免盲目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其次,在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受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依托有利的经济条件、区位交通,通过扩大产业规模、推广线上营销等方式突破文旅资源禀赋较弱的条件制约,切实提高文旅产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第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注重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区域交通,加快构建和培育智慧文旅平台,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主要对我国30个省区市文旅融合发展模式进行探索,缺乏对微观层面样本的研究,因此后续研究可将研究视角细化至城市、县级层面,探讨不同背景下文旅融合的现实路径。其次,本文研究时段为2010–2019年,缺乏对后疫情时代文旅发展模式新特征的探索,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继续跟进与补充的重要议题。此外,囿于fsQCA方法对前因条件数量的限制,本文未能将全部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文旅融合驱动路径指标体系之中,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大研究范围,全面揭示文旅融合驱动路径。

参考文献:

[1] Douglas E J, Shepherd D A, Prentice C.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a finer-grained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0, 35(1): 105970.

[2] Fan T, Xue D Q. Spatial correl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China: LISA analysis based on coordination model[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25(9): 967~980.

[3]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4] Li Y F, Li Y, Zhou Y,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 coupling mod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 (98): 127~133.

[5] Liu C H S. Examining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transfer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practi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64): 258~270.

[6]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7] Ragin C C, Fiss P C. Net effects analysis versus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J].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2008(240): 190~213.

[8] Tang Z.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evalua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46): 11~19.

[9] Xie X M, Wang H W. How ca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modes push product innovation forward? An fsQCA analy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108): 29~41.

[10] Yang Y. Agglomeration dens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6): 1347~1359.

[11] Zha J P, He D Q, Zhu Y, et al. Evalu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tourism inefficiency considering heterogeneous technology: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22, 46(2): 370~399.

[12] Zha J P, Li Z Y. Drivers of touris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Tourism Economics*, 2017, 23(5): 941~962.

[13] Zhang J P, Cheng M W, Wei X Y, et al. Does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affect divorce rate? Evidence from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18, 10(10): 3701.

[14] Zhu L, Luo J, Dong Q L, et 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resources; Dynamic change and improvement path[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1 (170): 120890.

[15] 鲍洪杰, 王生鹏.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10, 29(8): 74~78. [BAO Hongjie, WANG Shengpeng. Coupling analysis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J]. *Industrial Technology & Economy*, 2010, 29(8): 74~78.]

[16] 陈红玲, 郑馨. 城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动态关联研究——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 PVAR 模型分析[J]. 生态经济, 2021, 37(8): 112~117, 125. [CHEN Hongling, ZHENG Xin.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 PVAR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integration[J]. *Ecological Economy*, 2021, 37(8): 112~117, 125.]

[17] 陈秀琼, 黄福才. 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J]. 地理学报, 2006, 61(12): 1271~1280. [CHEN Xiuqiong, HUANG Fucui. Temporal change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ese inbound tourism[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12): 1271~1280.]

[18] 程晓丽, 祝亚雯. 安徽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 32(9): 161~165. [CHENG Xiaoli, ZHU Yawen.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culture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9): 161~165.]

[19] 戴斌. 文旅融合时代: 大数据、商业化与美好生活[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11): 6~15. [DAI Bin. The age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ig data, commercialization and better life[J]. *Frontiers*, 2019(11): 6~15.]

[20] 戴斌. 数字时代文旅融合新格局的塑造与建构[J]. 人民论坛, 2020(Z1): 152~155. [DAI Bin. The shap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era[J]. *People's Tribune*, 2020(Z1): 152~155.]

[21] 杜梦珽, 杨晓霞, 陈鹏. 基于百度指数的网红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研究——以重庆洪崖洞为例[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45(6): 72~79. [DU Mengting, YANG Xiaoxia, CHEN Peng.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scenic spot based on Baidu Index: Taking Hongyadong of Chongqing as a case[J].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

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0, 45(6): 72~79.]

[22]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DU Yunzhou, JIA Liangding.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A new way of management research[J]. *Management World*, 2017(6): 155~167.]

[23] 冯学钢, 程馨. 文旅元宇宙: 科技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J]. 旅游学刊, 2022, 37(10): 8~10. [FENG Xuegang, CHENG Xin. Cultural tourism metaverse: A new model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empowered by technology[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0): 8~10.]

[24] 冯学钢, 梁茹. 文旅融合市场主体建设: 概念体系与逻辑分析框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4(2): 130~141, 177. [FENG Xuegang, LIANG Ru. Market entities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 conceptual and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 2022, 54(2): 130~141, 177.]

[25] 傅才武. 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73(2): 89~100. [FU Caiwu. On the internal logic 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2020, 73(2): 89~100.]

[26] 高楠, 马耀峰, 李天顺, 等. 基于耦合模型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1): 62~68. [GAO Nan, MA Yaofeng, LI Tianshun, et al. Study on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based on coupling model: A case study of Xi'an[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 62~68.]

[27] 洪学婷, 黄震方, 于逢荷, 等. 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及补偿机制[J]. 经济地理, 2020, 40(9): 222~232. [HONG Xueting, HUANG Zhenfang, YU Fenghe,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cultural compens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9): 222~232.]

[28] 侯兵, 周晓倩. 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J]. 经济地理, 2015, 35(11): 211~217. [HOU Bing, ZHOU Xiaolia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te-

gration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1): 211~217.]

[29]黄婧涵,蓝庆新,展金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评价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3(2): 202~213. [HUANG Jinghan, LAN Qingxin, ZHAN Jinyong.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J]. *China Soft Science*, 2023(2): 202~213.]

[30]金春雨,程浩,宋广蕊.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的我国区域旅游业效率评价[J]. *旅游学刊*, 2012, 27(11): 56~65. [JIN Chunyu, CHENG Hao, SONG Guangrui.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China's efficiency of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three-stage DEA model[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11): 56~65.]

[31]李锋,陈太政,辛欣.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产业结构演化关系研究——以西安旅游产业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1): 69~76. [LI Feng, CHEN Taizheng, XIN Xi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o-integr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from Xi'an[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 69~76.]

[32]李丽,徐佳.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其驱动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20): 49~52. [LI Li, XU JiG. Measurement of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its driving factors[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0, 36(20): 49~52.]

[33]厉新建,宋昌耀.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逻辑框架与战略重点[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6(1): 35~42. [LI Xinjian, SONG Changya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Logical framework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J].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 2022, 56(1): 35~42.]

[34]厉新建,宋昌耀,殷婷婷.高质量文旅融合发展的学术再思考:难点和路径[J]. *旅游学刊*, 2022, 37(2): 5~6. [LI Xinjian, SONG Changyao, YIN Tingting. Academic rethinking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culture and tourism: Difficulties and paths [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2): 5~6.]

[35]李臻.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文旅产业发展趋势分析[J]. *人民论坛*, 2019(26): 80~81. [LI Zhe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opening up[J]. *People's Tribune*, 2019(26): 80~81.]

[36]刘安乐,杨承明,明庆忠,等.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态势及其驱动力[J]. *经济地理*, 2020, 40(6): 203~213. [LIU Anle, YANG Chengyue, MING Qingzhong, et al. Spatial-temporal coordin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provincial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6): 203~213.]

[37]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1): 105~112. [LIU Yaobin, LI Rendong, SONG Xuefeng. Analysis of coupling degree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5, 20(1): 105~112.]

[38]龙井然,杜姗姗,张景秋.文旅融合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与模式[J]. *经济地理*, 2021, 41(7): 222~230. [LONG Jingran, DU Shanshan, ZHANG Jingqiu. Mechanism and model of rural vitalization guided by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7): 222~230.]

[39]罗浩,颜钰堯,杨旸,等.中国各省的旅游增长方式“因地制宜”吗?——中国省际旅游增长要素贡献与旅游资源比较优势研究[J]. *旅游学刊*, 2016, 31(3): 43~53. [LUO Hao, YAN Yurao, YANG Yang, et al. Ca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explains tourism growth models of Chinese provinces? An inter-provincial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o tourism growth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3): 43~53.]

[40]马波,张越.文旅融合四象限模型及其应用[J]. *旅游学刊*, 2020, 35(5): 15~21. [MA Bo, ZHANG Yue. Four quadran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5): 15~21.]

[41]马晓京.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J]. *旅游学刊*, 2000, 15(5): 50~54. [MA Xiaojing. On developing national touris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J]. *Tourism Tribune*, 2000, 15(5): 50~54.]

[42]马勇,童昀.从区域到场域:文化和旅游关系的再认识[J]. *旅游学刊*, 2019, 34(4): 7~9. [MA Yong, TONG Yun. From region to field: Re-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4): 7~9.]

[43]彭华.旅游发展驱动机制及动力模型探析[J]. *旅游*

学刊,1999(6):39~44. [PENG Hua. An analysis of driving mechanism and driving force mod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1999(6): 39~44.]

[44]曲景慧.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变动分析[J]. 生态经济,2016,32(9):129~134. [QU Jinghui.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y*, 2016, 32(9): 129~134.]

[45]石燕,詹国辉.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指数建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以江苏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2021(7):165~172. [SHI Yan, ZHAN Guohui. Index constru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s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1(7): 165~172.]

[46]孙剑锋,李世泰,纪晓萌,等. 山东省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与优化[J]. 经济地理,2019,39(8):207~215. [SUN Jianfeng, LI Shitai, JI Xiaomeng, et al. Coupl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cul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Shandong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8): 207~215.]

[47]唐承财,刘亚茹,万紫微,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J]. 地理学报,2023,78(4):980~996. [TANG Chengcai, LIU Yaru, WAN Ziwei, et 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fluencing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4): 980~996.]

[48]唐睿. 我国文旅产业融合效率评价及动因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22(2):23~33. [TANG Rui.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motiv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China: On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2): 23~33.]

[49]陶克涛,张术丹,赵云辉. 什么决定了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 ——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2021,37(5):128~138,156,10. [TAO Ketao, ZHANG Shudan, ZHAO Yunhui. What does determin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A study on co-movement effect based on QC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5):

128~138, 156, 10.]

[50]田里,张鹏杨. 旅游产业融合的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构建[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9):119~123. [TIAN Li, ZHANG Pengya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frame construction about integ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J]. *Technoeconomics & Management Research*, 2016(9): 119~123.]

[51]王经绫. 民族地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影响要素的系统建构——基于71个民族县域文旅融合发展要素调查问卷的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8):24~30. [WANG Jingling.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influencing elements of the fusio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ethnic areas[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41(8): 24~30.]

[52]汪永臻,曾刚. 西北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2020,40(3):234~240. [WANG Yongzhen, ZENG Gang.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Northwest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3): 234~240.]

[53]翁钢民,李凌雁. 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J]. 经济地理,2016,36(1):178~185. [WENG Gangmin, LI Lingya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integrational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 178~185.]

[54]吴丹丹,冯学钢,马仁锋,等. 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J]. 旅游学刊,2023,38(2):47~65. [WU Dandan, FENG Xuegang, MA Renfeng, et al. Nonlinear effect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ouris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2): 47~65.]

[55]吴丽,梁皓,虞华君,等.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J]. 经济地理,2021,41(2):214~221. [WU Li, LIANG Hao, YU Huajun,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2): 214~221.]

[56]徐翠蓉,赵玉宗,高洁. 国内外文旅融合研究进展与启示:一个文献综述[J]. 旅游学刊,2020,35(8):94~104. [XU Cuirong, ZHAO Yuzong, GAO Jie.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sigh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8): 94~104.]

[57]于秋阳,王倩,颜鑫.长三角城市群文旅融合:耦合协调、时空演进与发展路径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4(2): 159~172, 178. [YU Qiuyang, WANG Qian, YAN Xin.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city clust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time-spat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54(2): 159~172, 178.]

[58]袁俊,高智.珠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1): 108~112. [YUAN Jun, GAO Zhi. Measurement of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Pearl River Delta[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18, 34(1): 108~112.]

[59]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J]. 旅游学刊, 2020, 35(3): 62~71. [ZHANG Chaozhi, ZHU Minmi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Multi-understandings, various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3): 62~71.]

[60]张春香,刘志学.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河南省文化旅游产业分析[J]. 管理世界, 2007(5): 152~154. [ZHANG Chunxiang, LIU Zhixue. Analysis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J]. *Management World*, 2007(5): 152~154.]

[61]张海燕,王忠云.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0, 26(4): 322~326. [ZHANG Haiyan, WANG Zhongyun. Research on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cultural industry[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10, 26(4): 322~326.]

[62]张进福.物之序:从“旅游资源”到“旅游吸引物”[J]. 旅游学刊, 2021, 36(6): 45~59. [ZHANG Jinfu. From "tourism resource" to "tourist attraction"[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6): 45~59.]

[63]张苏秋,顾江,王英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知网 CSSCI(1998~2019)数据[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4): 142~149. [ZHANG Suqiu, GU Jiang, WANG Yingjie.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CSSCI

(1998~2019)[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0(4): 142~149.]

[64]张雪晶,陈巧媛,李华敏.从体验对象到体验场域: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组态分析[J]. 旅游学刊, 2022, 37(5): 33~44. [ZHANG Xuejing, CHEN Qiaoyuan, LI Huamin. From experiencing object to experiencing field: 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5): 33~44.]

[65]张琰飞,朱海英.西南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2): 16~21. [ZHANG Yanfei, ZHU Haiy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Southwest China[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3, 32(2): 16~21.]

[66]张勇,蒲勇健,陈立泰.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基于系统耦合互动的观点[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6): 57~69. [ZHANG Yong, PU Yongjian, CHEN Litai. Urbaniz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 view based on system coupling interaction[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3(6): 57~69.]

[67]张圆刚,黄业坚,余向洋.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路径的组态视角研究——基于黄山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 457~467. [ZHANG Yuangang, HUANG Yejian, YU Xiangyang. Pathway of influence of rural tourism policy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Huangshan case stud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3): 457~467.]

[68]赵书虹,陈婷婷.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动力解析及机理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8): 81~93. [ZHAO Shuhong, CHEN Yingting. Dynamic analysis and mechanism research of the interg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ethnic areas[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8): 81~93.]

[69]郑陈柔雨,杨存栋,任雯星.民族地区文旅产业融合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22, 31(3): 613~623. [ZHENG Chenrouyu, YANG Cundong, REN Wenxing.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n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ethnic regions: Taking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2, 31(3): 613~623.]

[70]朱鹤,张圆刚,林明水,等.国土空间优化背景下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征、认识与关键问题[J].经济地理,2021,41(3):1~15. [ZHU He, ZHANG Yuangang, LIN Mingshui, et 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 and space optimiz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standing and key issu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3): 1~15.]

[71]朱媛媛,周笑琦,顾江,等.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22,41(5):785~796. [ZHU Yuanyuan, ZHOU Xiaoqi, GU Jiang, et al. Spatial effect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5): 785~796.]

Research on Multiple Paths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emand-Supply-Support" Framework

Zha Jianping Li Cheng Tan Ting He Lamei Xu Dandan

Highlights:

- Construct a multi-level "demand-supply-support" index system to optimiz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Apply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linkage effect of multiple condi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Summarize the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nd it is also inherently essential to compensate for the weakness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study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asses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30 provinces(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driving conditions of demand, supply, and support. The results reveal the following: (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has improved in the 2010-2019 period, but grea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different region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demand and support are important conditions, whereas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wer and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play a particularly prominent role. (3)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predominantly driven by demand combined with support, where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region is boosted by support and demand separately;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driven by both demand and demand-suppor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ynergizing the multiple conditions of supply, demand, and support; effectively adjust the strategy for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local conditions; and improve the targeted core driving capacity to break the bottlenecks of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convergence; tourism 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